

# 科 学 发 展 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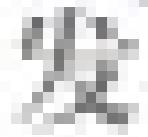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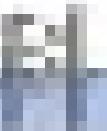
KeXueFaZhanGuan

于文俊 刘丹 万小梅 编著

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理念

 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PEOPLE'S PRESS

科  
學  
展  
現



科 學 展 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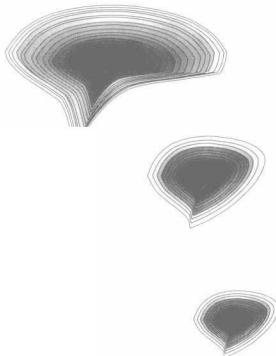
科 學 展 現

# 科学发展观

KeXueFaZhanGuan

——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理念

于文俊 刘丹 万小梅 编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PEOPLE'S PRESS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发展观—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理念. 丁文俊 刘丹 万小梅编著.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10

ISBN 7 - 216 - 04335 - 9

I . 科…  
II . ①丁…②刘…③万…  
III . 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 . D6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1789 号

**科学发展观  
——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理念**

丁文俊 刘丹 万小梅 编著

---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发行: 邮编: 430070

---

印刷: 武汉市明伦印刷厂 经销: 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249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 - 216 - 04335 - 9/D · 686 定价: 18.00 元

---

本社网址: <http://www.hbpp.com.cn>

**第一章****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理念 1**

- 一、当代发展观的历史演变 1
- 二、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历史背景和必然性 10
- 三、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本质要求 18
- 四、科学发展观对当代中国发展的重大意义 25

**第二章****促进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30**

- 一、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的一贯精神 30
- 二、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36
- 三、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44
- 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49

**第三章****保持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 57**

- 一、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57
- 二、坚持“五个统筹”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62
- 三、协调发展中正确把握的几个关系 86

**第四章****实现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96**

- 一、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观念的一个重大突破 96
- 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压力 106
- 三、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119
- 四、坚持发展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相统一 125
- 五、走生产发展、社会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129

**第五章****“三个文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目标 135**

- 一、向“三个文明”战略目标格局的转变 135
- 二、加快实现现代化必须加强物质文明建设 139
- 三、加快实现现代化必须加强政治文明建设 145
- 四、加快实现现代化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151
- 五、“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和整体推进 158

**第六章****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162**

- 一、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 162
- 二、以人为本把人作为发展的主体和根本动力 168
- 三、把以人为本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 173
- 四、以人为本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178
- 五、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追求 186

**第七章****改革开放:科学发展观的动力机制 191**

- 一、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191
- 二、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97
- 三、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204
- 四、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211
- 五、实现各种改革的相互协调 218

**第八章****统筹兼顾: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224**

- 一、更新发展观念 224
- 二、创新体制机制 232

三、转变政府职能	237
四、改进工作作风	245
五、完善政策措施	250

## 第九章

### 正确的政绩观：科学发展观的评价体系 255

一、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紧密相关	255
二、深刻认识树立正确政绩观的紧迫性	258
三、用全面的实践的群众的观点看政绩	264
四、求真务实是正确政绩观的本质内容	269
五、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机制	276

## 后记 283

# 第一章

##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理念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又是当今时代的主题。20世纪中叶以来,发展问题愈益引起世界各国的共同关注,发展问题随之也成为世界各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理论研究经历了一个由片面到全面、由幼稚到成熟的不断完善过程,最终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最关注的是发展问题。中国的发展在为世界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也在为发展理论的发展添加着宝贵的思想财富。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初所树立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当代发展理论中最为宝贵的思想财富。这个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理念。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 当代发展观的历史演变

当代发展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形成的发展观。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发展的内涵越来越充实。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历史,发展观经历了从传统发展观到现代发展观的转变。具体地说,在国外,发展观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发展即经济增长的发展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工业国家大都受到物质匮乏的困扰,而战后非殖民化运动中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都普遍感到自己贫

穷落后。这样,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追求经济增长、消除物质匮乏或贫困状态作为自己最迫切的愿望。于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社会发展,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经济增长论就应运而生。

经济增长论是发展研究中较早形成的关于发展的理论。从时间上看,它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上,西方发展经济学提出了种种“良方”。以美国的威廉·刘易斯、沃尔特·罗斯托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看来,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经济馅饼不够大,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必须把蛋糕做大些”。刘易斯在其巨著《经济增长理论》中探讨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罗斯托则更加直言不讳地说,他关心的是经济增长而不是其他。可以看出,当时西方学者没有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经济增长论的基本观点是:发展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就是经济增长问题,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就在于工业化程度不够,经济馅饼不大;而加快工业化的步伐,提高工业化的程度,把经济馅饼做大,就会导致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因而,这种发展观都把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标准,把发展单纯地归结为物质财富的积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一发展观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热烈追求。显然,发展经济学所确立的目标是单向度的,它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忽视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价值。在传统经济学家看来,没有劳动参与的东西就没有价值,市场经济中没有交易的东西就没有价值。因此,资源和环境特别是自然资料常常是无价或低价的,可以无偿占用,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种理论误导,造成了掠夺式地开发自然资源,肆意破坏和污染环境,实行粗放型生产经营。与工业化有关的环境污染多与资源的开发和消耗有关。工业革命以来的巨大经济增长是以没有节制地消耗地球上一大半不可再生资源为代价的。二是只把 GNP(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标准。自从 20 世纪 30 年代凯恩斯提出以 GNP 作为指标度量经济增长以来,GNP 一直受到各国重视。GNP 是指商品与劳务的总和。简单地用

GNP 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水平是不够全面的,因为 GNP 并不反映经济生活中投入和产出的关系,不反映所取得的数字中资源和环境的代价,不反映生产的分配状况,掩盖了国家内部的贫富差别等。更深层的原因在于 GNP 的代表性不够,不能反映社会的全面发展程度。显然,这种增长第一的发展观没有正确揭穿经济社会内部诸因素之间的客观规律,是一种片面、畸形的发展观。

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的综合发展观。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的指导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某些国家的年增长率甚至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由于经济增长并不能体现收入分配的改善和社会结构的完善,不能反映技术进步的变化,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所期望的福祉,相反,却出现了高增长下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甚至局部战争频仍等现象。学术界将这种现象归纳为“有增长无发展”、“无发展的增长”,在理论上确认了发展与增长之间的差异。在这一阶段,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使许多人开始意识到,对于发展来说,经济增长固然带有基础和前提的意义,但毕竟不是发展的全部内涵和唯一规定。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除了经济尺度外,还应包括各项社会指标,即反映生活质量的“非经济尺度”。1969—1973 年,美国学者发动了一场“社会指标运动”,提出建立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生活、文化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发展价值体系,第一次冲击了以单一 GNP 为中心的传统经济学发展观。缪尔达尔曾将发展定义为“全部社会体系的向上运动”,托达罗(M·P·TM)在其《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一书中,将发展定义为“一个社会或社会体系向着更加美好和更为人道的生活的持续前进”。联合国在第二个 10 年(1970—1980 年)发展报告中指出:发展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福利设施的改善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联合国前秘书长吴丹在制订这个发展报告时,将发展概括为“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反映了对发展作为一个多方面变化过程

的认识。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1983年，法国学者佩鲁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写了《新发展观》一书，对新发展观进行了哲学概括：“这种发展观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这种综合发展观从“人”的角度确立研究视野，强调文化价值的关键作用。1985年，由拉兹洛主持的一个国际性的一般进化论研究小组对发展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合作的新的发展主题。总之，综合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以民族、历史、文化、环境、资源等内在条件为基础，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生态平衡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发展过程。这种发展观的局限性在于，它注重的是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因素发展的相互关系，没有进一步揭示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相互协调的必要性；它关注的重点是发展的当前状态，而没有考虑代际问题，即没有把满足当代人发展需求同满足后代人发展需求恰当地结合起来。

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源于人类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认识。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增长、城市化、人口增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愈益严重，人们愈来愈认识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具有不可逆性，不能只是狭隘地从环境保护角度，而应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环境和生态问题。后发展国家不应再是“先污染后治理”的思路，不能再以环境破坏为代价来实现发展，而应谋求一种环境保护与发展同步的新观念，这就为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提供了现实背景和理论前提。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和完善经历了一个过程：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使用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会议提出：“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随后这个概念逐渐被更多的官方文件使用。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报告以“共同的主题”、“共同的挑战”和“共同的努

力”三篇概括了当前人类发展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也指明了出路所在。报告清晰地表达了可持续发展观，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的需求，又不对后代满足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自然保护同盟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共同出版了《保护地球》一书，该书把可持续发展解释为：“人类生活在持续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容量中，同时又要改善人类生活的质量。”这一观点突出了发展的目的。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人类环境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全世界未来共同的发展战略，得到了与会各国政府的普遍认同，特别是会议通过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详尽地阐述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方略，进一步丰富了可持续发展理论。此后一些国际性会议深化了对可持续发展的涵义、目标和措施的认识。

可持续发展观一经提出，即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得到认同，并成为发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最早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是西方新经济学研究会（简称 TOES），它反对把社会进步仅仅视为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主张应当以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的决策为基本点，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协调运作中思考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这个研究过程中，经济学提出不能只注重资源优化配置，还应当注重制度的创新和公平分配。这个研究产生了包括产权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福利经济学等；政治学提出不能只注目于传统政治学的内容，而应考虑政治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以确立把保护环境作为人类政治行为的新政治思维；未来学认为，旧的工业生产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重新探讨发展与进步的方式，建立一种以智力资源为基础的生存文明，从而使人类走向更高级的、生态化的大发展。这些反映了人类对自身以前走过的发展道路的怀疑和反思，也反映了人类对今后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目标的憧憬和向往。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体现了人类对发展问题的突破性认识。

第四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以“人类发展”为核心的现代

发展观。

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概念,一种更新的发展观被人们普遍接受。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了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首次提出了“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的概念。自那时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都坚持发表《人类发展报告》,经过十多年时间,人类发展的概念和思想已经得到各国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和广泛接受。那么,什么是人类发展呢?1990年的首份《人类发展报告》将其定义为:“人类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民众的各种选择的过程。从原则上说,这些选择可以是无限的和随时间而变化的。但是在发展的各个层次上,三个最基本的选择是使民众享受健康长寿的生活,获得知识和获取体面的生活水准所必需的各种资源。此外还有许多为众人所重视的选择,范围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自由到从事创造性和建设性活动的机会,以及享有个人自尊和人权得到保障。”人类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类能力如健康、知识和技能的形成,另一方面是人们将他们所获得的能力运用于闲暇或生产性目的,或者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事务中的积极参与。人类发展的定义随着得到进一步调整、充实和完善。1994年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对这一人类发展观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人类带着潜在的能力来到这个世界上。发展的目的就在于创造出一种环境,在这一环境中,所有的人都能施展他们的能力,不仅为这一代,而也能为下一代提供发展机会”,“人类选择会远远超越经济福利”。2001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提出的定义保留了原有定义的精华,同时对发展的目的界定更加集中于人类生活的改善,在各种基本能力中突出强调了参与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了强化人类能力和拓宽人类选择的关系。简言之,人类发展是通过强化全体民众的能力而扩大人们的选择的过程,它强调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改善所有人的生活,增进人类幸福、自由、尊重、安全、公正、参与等。这一发展观从根本上扭转了发展理论忽视人的因素的趋势。

人类发展观是对以往的发展理论和实践的丰富和完善。它坚决主张将民众置于发展的中心地位,认为民众应该成为发展的受益者

而不是发展的工具,更不应该成为发展的牺牲品。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全球化等都只是人类发展的工具,应该服务于人类发展这一目的;它把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协调统一起来。强调发展要以人为中心,其最终目的是改善所有人的生活,为此要增进全人类的福利、自由、尊严、安全、平等和参与等,而后者实际上涵盖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这三个方面的目标;它要求考察影响人类能力的增强和人类生活的改善的所有积极和消极因素,如贫困问题、失业问题、性别不平等问题、种族歧视问题、艾滋病问题、环境退化问题、内战问题、金融问题、科技问题等都进入到人类发展理论的分析视野之中。这种议题的多面性和开放性,使得人类发展分析保持了开阔的视野和充满活力;它的倡导者努力发现影响人类生活重大问题并及时提出政策议题,同时提出了加强能力建设和赋予民众的政策努力方向,这对于各国和国际社会制定政策议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类发展观的倡导者还设计出衡量人类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用来评估各国人类发展的平均成就并进行国别排名。按照人类发展的观点,人是发展的最终目标,增长的收益必须转换为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才能真正促进人类发展。因此,像以往单靠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指标很难反映人类发展状况,国民收入和财富也不足以反映人类幸福。人类发展的倡导者更注重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演变。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体系,它包括三个基本因素:寿命、知识和生活水平。寿命,通过预期寿命来衡量;知识,通过成人识字率和受教育的平均年数来测量;生活水平,通过购买力,也就是将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调整为当地生活费用的水准(购买力平价PPP)。从三个要素可以看出,人类发展指数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和谐的综合反映。人类发展指数不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改进,也是对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有益补充,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公众对社会发展评价的注意力。

与当代国外发展观的历史演变相对应,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对发展观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终于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观。



对发展观的探索肇始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目的,就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情,参照苏联的建设经验,确立了发展战略目标,即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转变为富强的工业国,并把重工业作为建设的重点,同时兼顾轻工业等其他方面的发展,形成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自力更生为主,依靠外援为辅,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发展观,提出“将我国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sup>①</sup> 1956年,毛泽东又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着眼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初步探索了符合我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同年党的八大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于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1959年和1964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提出了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国防“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总的说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发展观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是基本正确的,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把一个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在发展方向上走了弯路。但它毕竟是特定历史阶段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尝试,并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条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思路。

20世纪70年代以后,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这就必然要求有新的发展理论来适应这一时代特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地观察和思考了当时世界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全局,提出了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加快发展，必须实行改革；加快发展，必须对外开放；加快发展，必须两手抓、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解决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目标等问题。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不仅要实现经济繁荣，而且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要在大力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切实抓好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提出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要控制人口，合理利用资源，保护自然环境。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他把通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培养“四有”新人，作为我国现阶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最直接任务。正是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党明确了走自己的路，确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提出并实施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这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一项重大飞跃，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面临着三个新情况：一是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标志，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自二战以来最为剧烈的变化，两极冷战格局结束，国际政治开始走向多极化；二是十四大以来，中国改革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从对旧体制的“破”为主转变为对新体制的“立”为主；三是如何使经济建设在 20 世纪 80 年代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下去，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发展到了关键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外形势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与 80 年代不同，在 80 年代，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到了 90 年代，我们要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继续前行，就必须解决现实提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经济越发展，对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越高、越迫切，也就更需要重视社会全面发展的问题。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强调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明确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等重大战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江泽民科学阐述了发展观的内涵。他多次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全面进步、全面发展的社会，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所谓社会全面发展，就是指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几个方面协调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和全面发展。它要求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注意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在注重当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未来的发展，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些新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推向了新的境界。

在总结以往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 21 世纪初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

## 二

##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历史背景和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发展观，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深刻总结了国内外发展问题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正式提出并阐述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是在 2003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按照“五个统筹”来推进改革和发展。对这样一个发展观，胡锦涛最早把它称作“科学发展观”。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个月，胡锦涛在江西、湖南的两次考察中都使用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他在江西考察时指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新路子。”他在湖南考察时又强调：“中部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要切实增强加快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牢固树立和坚决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思路，通过改革不断为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努力推动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即 2003 年 11 月 24 日胡锦涛主持